

【新闻与传播】

作为制度创新话语的“一国两制”:媒体建构与变迁特征*

——以《人民日报》报道为例

张志安 李宜乔

摘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两制”是相对独特的话语样本。主流媒体对“一国两制”的话语建构,既影响公众对这一概念的认知,也形塑着公众的国家认同。在建构性话语理论和批判话语分析的研究框架下,以《人民日报》报道为对象考察媒介中“一国两制”的话语建构,可以总结出文本维度、话语实践维度和社会实践维度三个层面话语建构的变迁特征。实质上,“一国两制”话语是针对政治制度、关乎制度创新的话语建构,其核心价值在于呈现话语、治理和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一国两制”;制度安排;批判话语分析;《人民日报》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06-0164-09

一、问题的提出

“一国两制”是党和国家为了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创造性制定的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曾谈道:“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几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①根据邓小平的论述,有学者将“一国两制”的含义概括为:“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以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现行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并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这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并存,共同进行和平建设。”^②

随着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一国两制”在港澳

地区全面付诸实践,由此开启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政治实践和管治模式。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庆祝活动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③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重大战略部署,对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提出五大任务要求,要求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2022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从总体上看,“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经历了复杂的历程和挑战。作为一项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一国两制”需要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并不断加以完善。

收稿日期:2022-04-12

*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数据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与防范体系构建研究”(16JZD006)。

作者简介:张志安,男,中山大学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外文局中山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广州 510275),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李宜乔,女,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博士生(广州 510275)。

一些学者围绕“一国两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了研究。有学者将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概括为“复杂单一制”^④,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通过基本法的设计体现为中央对地方的授权^⑤。这种授权关系,意味着中央管治与香港的高度自治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不断变迁的互动和博弈,这种授权不是一次性的、固定不变的,会随着中央与香港的关系发展被赋予新的内容和意义。^⑥有学者从国际规范的角度出发,提出“一国两制”是对国家“主权规范”的一种创新,“即在坚持主权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的同时,允许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在同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同时存在,从而促成了相关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⑦。还有学者从“一国两制”设计的法理基础、主权与治权的关系角度展开论述。在“一国两制”的设计中,“一国”强调国家主权的不可分割性,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但特别行政区能行使的管治权须经掌握主权的中央政府授权,“一国两制”是单一主权下多种治权的体制。^⑧

“一国两制”是原则性和框架性的理论构想,需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一国”强调国家主权完整统一,是“一国两制”制度设计的目的和基础,“两制”强调的是过程和实施手段,“一国两制”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制度,其空间和界限需要随着社会实践和时代发展的需求,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两制”是相对独特的话语样本,因为“一国两制”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框架之中,既在解释具体涉港澳台政策和事件方面起着指导作用,也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整合进更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图景,并赋予其具体意义。

“一国两制”同时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议题,对于绝大多数公众来说,并不必然在实际生活经验中或通过政治参与得以感受,而须通过媒体资讯的传播、转述或阐释来获取相关的信息、了解政策的转变。媒介话语作为权力的载体,一方面通过传播信息对大众日常生活行为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突显了主体的话语权,通过“能指”和“所指”的不同结合,实现不同的意识形态“意指”。^⑨话语还具有社会实践功能,既有助于建构社会身份和认同,也有助于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设^⑩;媒介话语通过不同的符号和修辞,建构了国家认同。因此,媒介话语对“一国两制”的建构,既影响大众对这一概念的认知,也形

塑着大众的国家认同观念,媒介话语是“一国两制”话语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理论依据与研究方法

话语是“一个观念、概念与范畴的特定集合体”,其意义经由话语“被赋予到物理与社会现实之上”。^⑪在话语研究中,话语通常被视为参与者在特定语境中通过语言和其他符号资源进行交流的一种社会实践。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话语分析是对句子以上的语言结构进行的研究,包括剖析话语的结构和解释话语的连贯性。^⑫但话语分析不仅是单纯的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更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领域。以1952年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斯首次使用“话语分析”一词为标志,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学者们开始关注结构与符号学、文学话语、新闻话语等话语系统,为话语分析加入了跨学科分析的意义。^⑬

在诸多话语分析理论范式中,费尔克拉夫的批判话语分析是代表性范式之一。他的批判话语分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批评”,而是强调把话语置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语境下,考察社会关系中不同话语之间的相互影响、渗透和竞争。^⑭根据批判话语分析理论,话语对社会的建构作用既可以体现在知识的建构方面,也可以体现在个体和集体的身份以及个体之间关系的建构方面,话语维持了社会现实,并促进社会现实的再生产。^⑮批判话语分析力图把话语的文本分析与话语的社会实践分析结合起来,研究话语运用与话语实践、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关系变化,同时综合了话语的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路径,揭示话语的运作过程、规则和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⑯

在话语建构的理论和分析实践中,媒体报道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梵·迪克指出,新闻是运用语言系统叙述与建构事实的产物,新闻报道也是一种话语。^⑰大众媒体对现实进行表述,是权力的工具,体现了权力主体之间的争夺与行动。基于新闻价值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费尔克拉夫提出,新闻就是对社会事件的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或重新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新闻话语建构就是通过既有宏观社会结构观点的语境化或重新语境化,将事件嵌入到媒体文本之中。^⑱

党媒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是重要、权威信息的集散地,是国家主流话语的输出者、主流思想的

传播者、主流舆论的引导者,担负着传播正能量、促进大众共识、强化政治认同的重要职责。《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具有权威性和广泛影响力,对其他报纸媒体起到规范和引导的作用^⑨,同时国家政策报道中可以代表官方发声,传递着国家的态度和立场^⑩。从政治制度创新性话语的角度考察“一国两制”的话语建构,选择《人民日报》作为党媒的重要代表,分析官方媒体对“一国两制”话语的建构过程及其特征,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对“一国两制”话语建构的形成、变迁与完善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一国两制”规律性的认知,完善“一国两制”本身的内涵。

既往的文献较少在话语分析理论框架下研究“一国两制”的话语特征,本文尝试在建构性话语理论和批判话语分析的框架下,以《人民日报》为对象,考察“一国两制”的媒介话语建构,并回答以下研究问题:其一,《人民日报》建构“一国两制”相关议题呈现怎样的文本特点?其二,《人民日报》建构“一国两制”的话语过程中,呈现出怎样的话语实践特征、社会实践特征?其三,《人民日报》通过“一国两制”话语生产,怎样承担自身的媒介功能和传播角色,参与“一国两制”的媒介话语建构?

以往的批判话语分析通常运用在小规模的语篇分析上,近年来有学者将话语分析方法与语料库技术相结合,发展出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corpus-based CDA),从大量的语篇中选取典型的“语

言模式(linguistic pattern)”展开研究^⑪,具体策略包括通过识别主题词、关键词、词频、搭配等分析文本的特征,进一步考察话语是如何建构出来的^⑫。

本文通过“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以“一国两制”为关键词查找相关报道文章,自建《人民日报》“一国两制”报道语料库。经人工分析,剔除与主题不太符合的报道,共计获得 8364 篇文本(1984 年 9 月至 2021 年 12 月)。具体分析参照了费尔克拉夫提出的“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框架^⑬,在文本层面总结关键词、主题词等文本特征,在话语实践层面考察话语主题生成与阶段变迁特征,在社会实践层面分析话语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人民日报》的“一国两制”话语建构展开质性分析。

三、文本维度的“一国两制”话语

本文主要使用 Python 软件进行文本分析。首先,根据研究主题在词库中添加了与“一国两制”相关的专用政治词汇(如“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以达到分词的准确和完整。其次,删除停用词,包括不承担实际意义表达功能的词语和新闻报道中的惯用表达等。在对文本进行以上预处理后,使用结巴(jieba)工具包对文本进行分词,分词后由两位研究者将前 50 个高频词独立进行评分(包括保留、删除、合并、拆分),并删除无实际意义的词语。最后,共获得 50 个高频词。对关键词进一步归纳,可以总结为三组主题(见表 1)。

表 1 高频关键词及其词性

	高频关键词	词性	高频关键词	词性	高频关键词	词性
国家统一主题	香港	名词	中国	名词	国家	名词
	人民	名词	澳门	名词	祖国	名词
	台湾	名词	和平	名词	统一	动词
制度建设主题	社会	名词	制度	名词	社会主义	名词
	法律	名词	政策	名词	创新	名词
	民主	名词	选举	名词	宪法	名词
经济发展主题	发展	动词	建设	名词	经济	名词
	稳定	形容词	合作	动词	繁荣	形容词
	企业	名词	市场	名词	现代化	动词

1. 国家统一主题

《人民日报》关于“一国两制”话语中较多使用“香港”“台湾”“统一”等关键词。实现国家统一是国家建构的重要部分,涉及这一主题的关键词频率

也较高,并在香港 1997 年回归祖国时达到了高峰。“一国两制”是党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国家结构理论贡献的全新中国方案,“回归祖国”“和平”“国际”等关键词,反映了国际语境对“一国两制”实践

的高度关注。

2. 制度建设主题

作为一项政治制度话语,《人民日报》的“一国两制”话语中频繁使用了“国家”“制度”“民主”等关键词。香港回归标志着“一国两制”这一理论首次得以实践,1997年前后有关“一国两制”理论意义的关键词达到小高峰。2014年以来,“反中乱港”势力在香港发动了数次暴力活动,给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严峻挑战。中央政府在关键时刻屡次做出回应,2015年之后,“党”“国家”“制度”等关键词频率增加,并在2020年又一次达到高峰。

3. 经济发展主题

“一国两制”的发展目标是促进香港和澳门的繁荣稳定,《人民日报》“一国两制”话语中频繁使用了“发展”“稳定”“合作”等关键词,强调了“一国两制”对港澳稳定发展的意义。从回归前的过渡时期到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再到进入全球化语境的21世纪,“繁荣”“经济”“长期”“交流”等关键词均诠释了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制度设计内涵。

从文本形式及消息来源看,《人民日报》关于“一国两制”的话语除常规新闻报道外,还包括了党代会报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领导人的讲话、重要文件全文等,基本囊括了各种官方话语形式。

从报道内容来看,《人民日报》关于“一国两制”的话语主要集中在重要政策和政治活动方面,如重要文件或公告的发布、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重要会

议、领导人出访外国、外国领导人来访中国、地方省市领导或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参加政治活动以及各类政府会议等新闻。这些话语往往涉及领导人讲话,强调“一国两制”的重要意义,以及国外政治人物对“一国两制”制度的高度评价等。

从消息来源和版面位置看,这些报道常以消息或要闻的形式出现在头四个版面,报道媒体主要是新华社消息或本报报道;此外,还有以来论形式发表专家学者、民主党派人士、机构负责人、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等不同身份作者的文章,内容包括港澳台评论和港澳台历史、文化、人物,或就某一新闻事件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等。

综上,《人民日报》话语的文本形式体现出高度政治化的性质,报道除考虑新闻价值外,较为重视政治意涵,宣传“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与中央保持一致。在“一国两制”话语建构的过程中,关键词的选择可归类为“祖国统一”“制度建设”“经济发展”三个主题,凸显了“一国两制”话语中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政治制度的创新设计以及两地共同发展的长远目标。

四、话语实践维度的“一国两制”话语

话语实践维度的分析主要指语篇的生成与解释,一般在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等方面展开。在《人民日报》关于“一国两制”报道的文本中,关键词和话语主题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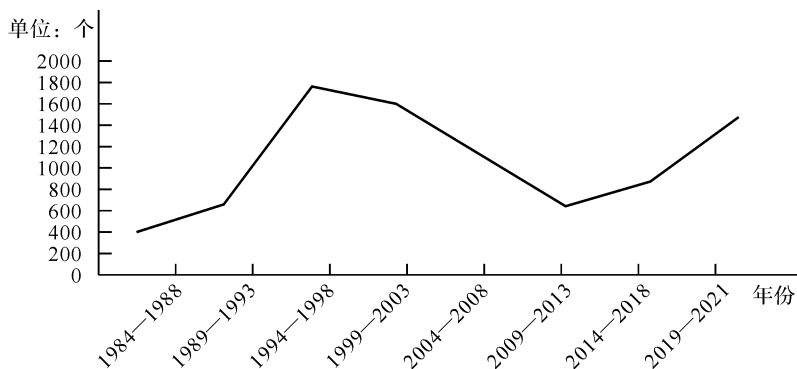


图1 1984—2021年《人民日报》关于“一国两制”报道的数量变化图

1. 《人民日报》对“一国两制”报道的总体特征

《人民日报》对“一国两制”的报道总体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事件驱动型变化特征,随着重大涉港决策、中央与香港关系的演变而起伏变化(见图1)。“一国两制”的构想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酝酿;1981年,叶剑英发表了《对台湾同胞的讲话》,提出

了九条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方针,明确了这一构想的具体内容;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的谈话中,正式提出了“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②1984年,《人民日报》首次在报道中提到这一概念,从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到1997年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的实

践迎来了第一个历史性的重大时刻,报道数量明显增加,并在香港回归祖国当年达到顶峰。随着香港和澳门相继回归祖国,到了 2008 年左右,“一国两制”在港澳地区实践了约 10 年,其间的相关报道主要总结了“一国两制”实践的成就和经验,数量达到第二个高峰。直到 2010 年左右,内地与香港经济发

展逐渐融合,两地关系稳固发展,报道数量相应减少。2014 年 6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全面阐述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的实践成就,是“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之一。此后,相关报道的数量再次呈现上升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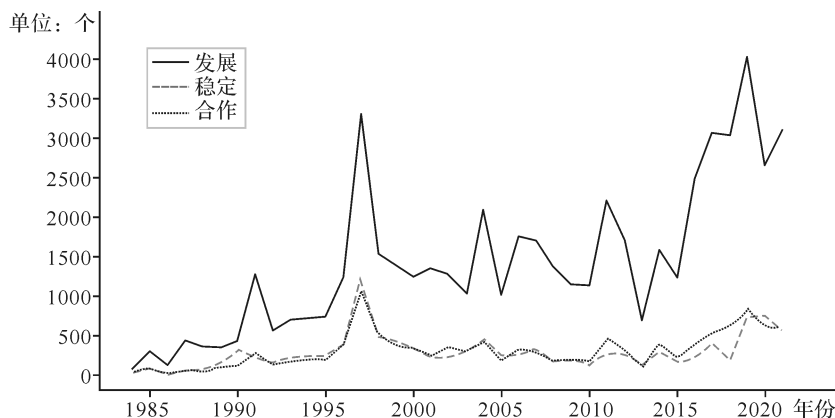


图2 繁荣稳定主题变迁示意图

2.“一国两制”的话语建构

“一国两制”的话语建构包含着保持港澳繁荣稳定和实现祖国统一等多重内涵。

第一,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一国两制”的长远目标。在“一国两制”话语生产的全过程都体现了内地和香港谋求共同发展的诉求。从图2可见,“发展”一词从“一国两制”提出以来出现的频次都较高。1984到1992年左右,与繁荣稳定相关的词语频次呈逐渐上升趋势。1985年5月27日,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生效,香港进入回归前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恰逢内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全面开放阶段,为香港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转型带来新机遇。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香港制造业大量内迁,内地走上工业化道路,两地经济、工业进一步整合。因此,以经济发展为关键词的报道在这一阶段达到一个小的峰值。1997年香港回归,相关主题词达到了高峰。

香港回归初期,中央以“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为根本宗旨,引导香港继续发挥经济发展优势。尽管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非典疫情等冲击,在中央支持下,香港成功抵御了危机并进入调整期。这一阶段香港经济发展经历了起伏,但总体运行良好,“发展”“稳定”“合作”等关键词的数量不断达到小峰值。

香港回归后,中央和特区政府相继制定了一系

列促进内地与香港经济发展和融合的政策,如2003年正式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当中包括放开内地居民到香港自由行等,推动了更加全面的交流与合作。2012年,在香港回归15周年之际,中央政府制定新的政策措施,加强内地与香港合作,进一步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如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九,推动内地与香港企业联合“走出去”,支持珠三角地区港口、机场、轨道交通之间的衔接与合作等。之后,两地经济合作不断增加。2014年以后,以“发展”为主题的报道数量不断增加。回归20余年后,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引领香港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全新阶段。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颁布,香港参与大湾区建设,这既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体现,更能促进香港经济得到更大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前后,经济发展和繁荣稳定主题达到了第二个高峰。

2019年,“修例风波”引发的香港社会动荡对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带来一定的挑战,《人民日报》仍然强调“发展”相关的议题。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颁布之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重新成为社会主要议题,因此,从2020年开始“发展”一词的频率再次呈现上升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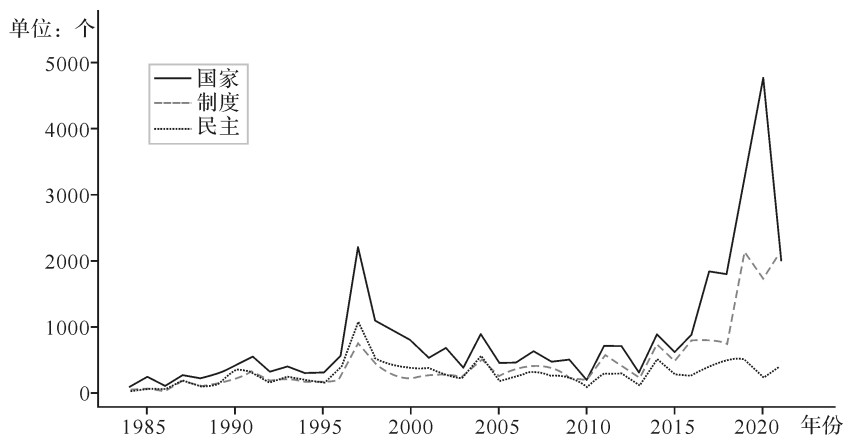


图3 制度建设主题变迁示意图

第二,强调“一国”基础、尊重“两制”差异是“一国两制”的宪制原则坚守。“一国两制”的政治基础是坚持“一国”,“两制”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在“一国两制”话语建构的全过程都体现出这个特点(见图3)。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一国两制”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⑤从图3可见,1997年标志着

“一国两制”从构想成为现实,有关国家、民主、制度的主题词频次呈现高峰。2014年以来,从非法“占中”到“修例风波”,“反中乱港”势力给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严峻挑战,为制度发展带来不确定因素。2015年之后,《人民日报》呈现的“国家”“制度”等主题不断强化,并在2020年达到新峰值。中央政府在关键时刻做出有力回应,并于2021年12月20日发布《“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再次强调了“一国两制”的根本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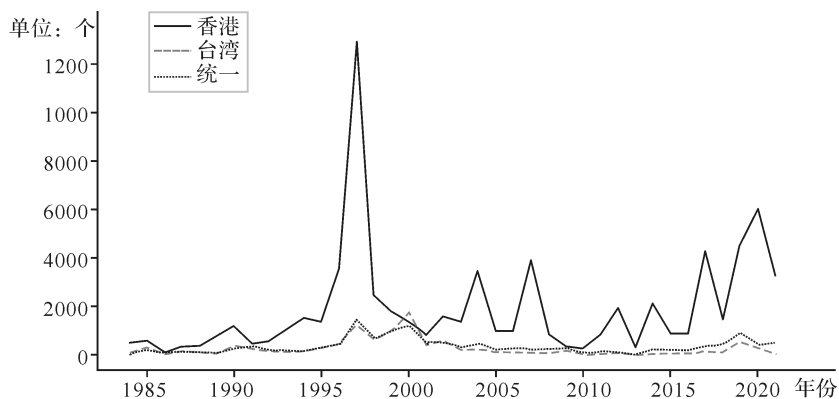


图4 国家统一主题变迁示意图

第三,倡导国家统一,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诉求。“一国两制”构想最初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提出的,首先被运用于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问题上。“一国两制”话语生产的全过程都强调国家统一的意涵(见图4)。由于历史原因,海峡两岸暨港澳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理念也存在较大差异,但同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传承中华文化。“一国两制”是在充分尊重海峡两岸暨港澳各方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表达统一的诉求。《人民日报》对“台湾”和“统一”主题,一直保持了稳定的关注度。1997年7月1日香港

回归前后,国外舆论对中国通过“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的进程空前关注,《人民日报》对香港现状也给予集中报道。

3.“一国两制”话语的变迁特征

1984年以来,《人民日报》对“一国两制”的话语生产和建构,在不同时间段呈现出不同话语主题。在话语变迁的过程中,《人民日报》发挥了意识形态的统合作用,建立了主导性的话语秩序。

第一阶段(1984—2002年):“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话语建构。20世纪80年代,在邓小平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较为系统地论述“一

国两制”的基础上,《人民日报》的报道强调了“一国两制”对于保障香港在过渡时期繁荣和稳定的重要意义,以及为国际社会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重要范例。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也是党和国家首次通过“一国两制”这一创举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从回归前的过渡时期到回归后 5 年这一历史阶段,中央所面临的首要工作是保持过渡期的平稳、主权顺利回归和特区政府的成立并行使治理职能,进而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人民日报》通过主权话语和制度创新话语,凸显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创新设计和制度安排合法性及时代贡献。

第二阶段(2003—2013 年):经济发展与制度建设主题并重。从 2003 年开始,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等危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是这一阶段的重点。港澳地区与内地融合、互惠的话语较多被使用,并将经济发展与民族主义论述相结合。这一阶段的话语特点首先是突出了“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和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提供的支持和保障,体现中央政府始终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作为处理涉港事务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也很好地配合了国家的发展。其次是强调了经济发展和繁荣稳定有赖于基本法的设计和安排,制度话语在这一阶段突出了基本法的意义与作用,着重强调“一国两制”和全面贯彻落实基本法是繁荣稳定的重要保障。

主权的回归,并不完全等同于人心的回归。基于历史及现实的多种因素,港人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方面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部分港人对“一国两制”进行了另类诠释。自 2003 年起,围绕基本法第 23 条的立法等社会问题,香港出现了数次社会运动,部分甚至演化为暴力活动。中央在全力支持香港经济发展的同时,强调“一国”是香港社会的政治基础,尊重“两制”差异,认为这样才是对“一国两制”的宪制原则坚守。在这个历史阶段,《人民日报》体现了政治话语引导者的舆论建构,如有学者认为:“‘一国’与‘两制’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先与后、源与流的关系。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只讲‘两制’,不讲‘一国’,高度自治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②8}

第三阶段(2014—2021 年):宪制秩序下的全面管治话语建构。自 2014 年以来,部分激进的香港青

年学生提出“勇武抗争”这种“自残式”的社会抗争活动,试图瘫痪“一国两制”,借以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针对这些对“一国两制”的严峻挑战以及部分港人对国家认同的缺位、境外敌对势力的介入等问题,中央政府的首要任务转为保障国家和主权的安全、领土统一和完整。继 2014 年发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中央“全面管治权”,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以执政党大会报告的方式强调“全面管治权”的重要性,指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还要求“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②9}。这一阶段《人民日报》关于“一国两制”的话语特征,是通过国家权力实施建构性的国家主义话语,包括宪制秩序话语和全面管治话语,强调中央政府的权威,体现全面依法贯彻“一国两制”的意志。全面管治话语则在“一国”和“两制”的关系论述中,强调“一国”原则是基本前提,“两制”是“一国”的派生,源于中央授权的地方事务管理权,“高度自治权并非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更不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固有的权力”^{③0}。

五、社会实践维度的“一国两制”话语

社会实践维度,是通过社会文化层面揭示话语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代表的权力关系以及所维护的意识形态,研究话语文本如何对社会实践过程进行建构。话语在建构社会系统的同时,也受到社会实践的影响和制约。

1. 文本生产者的意识形态:《人民日报》是“一国两制”话语的主要传播者和政治舆论的引导者

“一国两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日报》围绕“一国两制”的话语建构,正是这种国家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集中呈现。《人民日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划为哈林和曼奇尼提出的“民主化社团主义”模式^{③1}:媒体产业化发展方面,发行量大,采编人员齐备,受众广泛;媒体专业化程度方面,《人民日报》有制度化的自我道德规范;关于媒体系统中的政府角色,《人民日报》作为党媒,最大特征之一就是政治平行性。从文本生产者的意识形态考察,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具有权威性和广泛的影响力,在“一国两制”话语建构过程中,代表官方和政府发声,代表国家利益,传递

国家立场,体现主流价值观。

2.“一国两制”话语的完善和补充:来自香港社会实践的反馈

在社会实践维度,“一国两制”理论与社会实践呈现了明显的双向反馈互动模式。香港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活在“一国两制”理论框架下进行,受到理论和制度的指导和制约,现实的社会实践很难与既有理论保持完全一致,社会实践中出现了超前于理论的事件,反馈给理论体系,使得理论体系不断补充和完善。“一国两制”的话语建构过程,必须因应这些社会实践的反馈,不断做出调适。

《人民日报》担负着权威信息发布者的责任,建构主流话语,传播主流思想。通过宪制秩序话语和全面管治话语,强调中央政府的权威,体现全面依法治国“一国两制”的意志,并最终形成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202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2021)等重大决策。“一国两制”理论体系的完善和补充,对香港社会实践做出了规范和指引。未来“一国两制”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双向反馈互动仍然会持续不断地进行,“一国两制”的理论体系会不断完善。

六、结论

本文在建构性话语理论和批判话语分析的框架下,以《人民日报》为对象考察了媒介话语中“一国两制”的建构,总结出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维度话语建构的变迁特征:其一,在文本层面,从语料库中提取到的关键词,可归纳为“国家统一”“制度建设”“经济发展”三个主题,与“一国两制”话语中的主权、制度、繁荣稳定等内容相吻合。在文本形式和消息来源方面,基本涵盖了官方政治话语的各种形式和主体,体现了高度政治化的特点。其二,在话语实践层面,《人民日报》的报道总体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事件驱动型变化特征,随着重大涉港决策、中央与香港关系的演变而起伏变化;《人民日报》的话语强调和突显了“一国两制”背后的国家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宪制原则等核心诉求。从历时性的角度看,《人民日报》“一国两制”的话语建构,大致经历了从强调政治制度安排,到经济发展与制度建设主题并重,再到强调中央政府的全面管治

权的政治性话语的变化。其三,在社会实践层面,《人民日报》作为文本生产者,阐释了党和政府在“一国两制”构想背后对于国家主权、完整统一的态度和立场,揭示了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这种话语形式,既反映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具体实践对话语本身的影响,同时也指导着具体的实践,呈现出“一国两制”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双向反馈互动模式。

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维度的分析可见,“一国两制”话语实质上是针对政治制度的话语建构,是关于政治制度创新的话语,其核心内涵是关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作为一项制度话语,“一国两制”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基本法是使之从设想成为制度事实的关键,基本法以法律文本的形式对“一国两制”的内涵和制度进行了安排。换句话说,基本法中包含了对“一国两制”理念的完整表述,建构了关于“一国两制”的基本论述。但基本法的规定“宜粗不宜细”,现实中关于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权力划分、高度自治权的具体行使范围等还存在模糊不清的地方。^⑩

因此,基本法中“一国两制”话语抽象性和宏观性的特点,也使其具备了开放性,为以媒体为代表的其他话语主体提供了进一步阐释的空间。“一国两制”制度本身需要在具体实践探索中不断根据实际效果和面临的挑战做出调整,话语建构也跟随社会实践表现出从抽象到具体、从隐晦到明确的动态变化趋势,在体现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复杂关系的同时,不断得以补充和完善。作为一种制度创新话语,《人民日报》关于“一国两制”话语的建构实践为主流媒体的政治传播功能优化提供了积极启示。

注释

-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档案室编:《〈邓小平文选〉专题摘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556页。②吴大英、杨海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04页。③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7月2日。④王禹:《“一国两制”宪法精神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页。⑤程洁:《中央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以基本法规定的授权关系为框架》,《法学》2007年第8期。⑥张定淮、底高扬:《论一国两制下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授权的性质》,《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5期。⑦袁正清、赵洋:《“一国两制”与主权规范创新》,《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4期。⑧王邦佐、王沪宁:《从“一国两制”看主权与治权的关系》,《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2期。⑨吴学琴:《媒介话语的意识形态性及其建设》,《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期。⑩

Norman Fairclough.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p.64. ⑪Maarten Hajer.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cy Proc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44. ⑫何兆熊:《话语分析综述》,《外国语》1983 年第 4 期。⑬潘雯:《“话语”之用——关于“话语”概念的一个跨学科观察》,《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0 年第 4 期。⑭辛斌:《辛斌语言学选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85—188 页。⑮Norman Fairclough, Ruth Wodak.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Teun A.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London: Sage, 1997, pp.258-284. ⑯胡春阳:《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73 页。⑰[荷]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华夏出版社,2003 年,第 1 页。⑱Norman Faircloug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94-96. ⑲夏倩芳、张明新:《社会冲突性议题之党政形象建构分析——以〈人民日报〉之“三农”常规报道为例》,《新闻学研究》2007 年 4 月号(第 91 期)。⑳陈薇:《被“标识”的国家:撤侨话语中的国家认同与家国想象》,《国际新闻界》2020 年第 1 期。㉑辛斌、高小丽:《批评话语分析:目标、方法与动态》,《外语与

外语教学》2013 年第 4 期。㉒钱毓芳:《媒介话语研究的新视野:一种基于语料库的批判话语分析》,《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3 期。㉓辛斌:《批评性语篇分析方法论》,《外国语》2002 年第 6 期。㉔齐鹏飞:《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调查研究和“一国两制”新思维的初步形成》,《中共党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㉕刘建飞:《“一国两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光明日报》2019 年 12 月 9 日。㉖夏勇:《“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人民日报》2004 年 2 月 23 日。㉗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19 日。㉘《依基本法正确处理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一论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人民日报》2014 年 6 月 30 日。㉙[美]丹尼尔·C.哈林、[意]保罗·曼奇尼:《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陈娟、展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66—74 页。㉚郭天武、陈雪珍:《论中央授权与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当代港澳研究》2010 年第 2 期。

责任编辑:沐 紫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s a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Discourse: Media Constructions and Its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 Take Reports from *People's Daily* for Example

Zhang Zhian Li Yiqiao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a relatively unique discourse sampl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by mainstream media not only affects people's cognition of this concept, but also shapes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Based on the constructive discourse theory and Fairclough'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theory, with relevant reports from *People's Daily* corpus as the analysis object, it can be concluded the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text, discourse practice and social practice. In essence,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discourse is constructed about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its core value lies in represent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scourse, governance and social change.

Key word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eople's Daily*